

张国刚等 ● 著

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



中国社会历史研究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历史研究丛书

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

张国刚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张国刚, 吴莉苇等著. —北京: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5
(中国社会历史研究丛书)

ISBN 7-5004-3001-9

I. 明… II. 张… III. 传教士-影响-汉学-研究-欧洲-中世纪~近代
IV. 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8087 号

责任编辑 郭 媛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郑以京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ass.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魏印刷厂

装 订 朝晖装订厂

版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5.25

插 页 2

字 数 392 千字

印 数 1—3 000 册

定 价 37.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历史研究丛书

(第一辑)

编委会主任 刘泽华 冯尔康 陈振江

执行主编 张国刚

122° 1/6

前 言

正如我在绪论中所强调的那样，西方汉学的研究决不是一般的学术信息的罗列，而是一种跨文化之间的对话，研究的难度很大。目前我们的所谓“汉学研究”大多停留在介绍层面，这是这门学科尚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的必然现象。西方汉学的内容十分庞大，本书只是研究西方汉学的童年时期，即明清传教士来华那一段，大体相当于 1500—1800 这三百年间。由于我们是从中西文化关系的角度来讨论西方汉学，所以我们把镜头拉得比较远一些。我们从殖民主义势力的东来，谈到耶稣会士在中国的工作，特别注意到他们报告的中国形象。中国物质文化风靡欧洲，营造出一个“中国热”的氛围。中国知识在欧洲日渐膨胀，使孔子哲学与华夏文化成为西方教俗世界热烈谈论的话题。汉学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了。16 世纪时，关于中国的报道几乎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专利。17 世纪时，德国柏林成为欧洲最大的中文图书中心。进入 18 世纪，法国人后来居上，那些像优秀的“国王数学家”一类的博学的传教士，真正充当了中西学术文化交流的使者角色。

16、17 世纪的西方汉学总体上说与基督教神学关系密切，欧洲本土的汉学家大多是业余学者或者是传教士。18 世纪西方汉学所讨论的问题则已有所不同，比如中文语言的研究、中国历史纪年的研究、大秦景教流行碑的研究和开封犹太人研究等问题，这些问题都与基督教有密切关系，又都从不同角度间接和侧

面地触及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民族交流的研究。中国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圣经》权威性的挑战，从而给启蒙时代欧洲思想的发展以有力推动。随着研究的深入，西方学者在对中国语言的结构、对中国浩如烟海的典籍的认识理解，以及对中国文化特性的把握上都有所突破，于是中国逐渐被作为与欧洲相对应的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和社会体系得到认可并加以研究。这些成就开启了西方汉学学术性殿堂的大门。

面对中国知识和中国研究，18 世纪欧洲的罗马教廷、宗教修会、民族国家、思想界在时代的变局中产生各种矛盾冲突，这一切在依然是中西交流首要渠道的传教士身上亦有不同程度体现。在欧洲的变革中法国因其文化、政治、经济实力和思想环境首当其冲，而在传教士队伍中法国耶稣会士也棱角分明，尤其是作为文化使者璀璨夺目。从这几章的叙述来看，欧洲人关注中国由来已久，但像 18 世纪这样把中国置于如此醒目特出的地位也只能是那种风雷激荡环境的产物，而雨住云收之后，再奇诡的山岚雾霭也终有消散之时。所幸的是中国在欧洲的异象毕竟也有一部分转化为更深刻持久的东西，以学术研究对象的形态继续传递其文化内涵。

在叙述欧洲的中文研究时，我们的视线已经越出 18 世纪而进入 19 世纪，这并未违背本书的主旨。从汉学的学术性转向来看，19 世纪与 18 世纪可以说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时期，但就汉学的整个发展而言，连续性同样不容忽视。从中文研究这个具体课题来讲，19 世纪事实上是 17、18 世纪的延续，其研究命题、研究手段、研究思路都是以前两个世纪的成果为基础，难以断然割裂。我们还希望通过对这个课题研究历程的完整叙述，多少能感受到具有神学背景的古老汉学与呈现社会科学特征的近代汉学如何在 19 世纪发生冲撞并交融转化，权当为下一步研究做个铺垫。

同样属于欧洲但是明显有自己文化特征和特殊历史传统的俄罗斯，在 18 世纪有一个全面西化的历程。这个时候，俄罗斯与

西欧声气相闻，在他们派遣的出使中国的使团里，有来自西欧的学者，其出使报告也在西方出版。俄国汉学总体说来与西欧是一个体系，所以，我们特辟一章介绍 16—19 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汉学。

这本书是我与我的博士研究生共同承担的一个课题，被列为天津市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也曾经获得国家教育部出国留学人员研究基金的资助。具体分工是，我撰写了第一章及第三章第四节，吴莉苇撰写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班立华撰写第五章，阎国栋撰写第六章。我通读了全书各章，并且作了必要的文字与内容的调整。书中引用前人成果，除一般基本事实的叙述外，我们尽量注明来源。错误与不当之处，尚请专家与学者不吝赐教。

张国刚

2001 年 3 月 8 日于南开

附记

在阅读了本书责编郭媛女士认真处理的书稿后，我不能不对她负责的工作态度表示由衷的敬意。她不仅仔细改正了本书的许多错别字，而且对于人名、书名前后翻译不一致之处也做了仔细的校正。没有她的辛勤劳动本书的错误会更多。在此，我还要感谢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特里尔大学图书馆、波鸿大学东亚学院图书馆、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研究所图书馆和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系图书馆，本书所使用的西文资料（俄文除外），基本上是我在这些地方搜集的。对于以上图书馆及南开大学图书馆的有关先生和女士，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2001 年 3 月 31 日 又记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西方汉学”：跨文化的对话	(1)
第二节 寻找东方：欧洲商业殖民势力的东来	(6)
第三节 郢燕书说：传教士与早期西方汉学	(15)
第二章 触摸丝绸故乡	
——中西贸易欣欣向荣与对中国的直观认识	(32)
第一节 罗柯柯风格	(32)
第二节 瓷器映出的中国	(34)
一、华瓷贸易	(34)
二、用瓷成风	(37)
三、仿制瓷器	(38)
四、变异的图像	(41)
第三节 飘逸的丝绸	(43)
一、在禁令中畅销	(43)
二、刺绣的魅力	(45)
第四节 布置中国式的家	(48)
一、厚重的家具	(48)

二、轻巧的壁纸	(50)
第五节 多姿多彩的中国生活	(51)
第六节 流动的中国园林	(53)
一、德国的中国风情	(54)
二、英华园林的兴衰	(58)
第三章 阅读理想王国	
——耶稣会士的创作热情与中国形象的巩固	(64)
第一节 16 世纪游记中的中国	(65)
一、相关游记	(66)
二、游记刻画的中国形象及其传布	(72)
三、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	(80)
第二节 耶稣会士文本中的中国形象	(86)
一、早期耶稣会士的报告	(87)
二、17、18 世纪的耶稣会士作品及其传播	(96)
三、耶稣会士塑造中国形象的过程	(112)
第三节 耶稣会士中国观影响下的欧洲思想界	(119)
一、法国启蒙思想家论中国的道德与制度	(119)
二、英国的自然神论者	(125)
三、德国的理性论哲学	(128)
第四节 耶稣会士的著作与欧洲文艺界的 中国兴趣	(133)
第五节 耶稣会士的学术著作与欧洲学者的 汉学兴趣	(139)
第四章 探求异域文明	
——法国耶稣会士的双重使命与汉学 研究格局的草创	(144)
第一节 法国在华传教区诞生的背景	(144)
一、罗马教廷力图削弱保教权	(144)
二、法国政府支持限制保教权	(147)

三、耶稣会与中国传教区的管理·····	(150)
第二节 法国传教区成立与法国耶稣会士	
大批来华·····	(155)
一、国王数学家来华·····	(155)
二、法国在华传教区成立·····	(159)
三、法国耶稣会士概况·····	(165)
第三节 法国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	(171)
一、景教碑研究·····	(171)
二、开封犹太人研究·····	(178)
三、《易经》研究与索隐派思想·····	(188)
四、中国编年史研究·····	(195)

第五章 超越通天塔

——耶稣会士的传教策略与西方对

中文的研究·····	(227)
第一节 16 世纪西方对中文的认识·····	(228)
一、16 世纪以前的基本情况·····	(228)
二、16 世纪葡萄牙、西班牙文献中关于	
中文的记述·····	(230)
三、16 世纪耶稣会士对中文的认识·····	(232)
四、传教士的中文著作与翻译·····	(234)
五、16 世纪欧洲所见中文·····	(235)
六、16 世纪欧洲学者对中文的认识·····	(237)
第二节 在华耶稣会士对中文的学习与研究·····	(241)
一、利玛窦的学习历程·····	(241)
二、传教士的学习感受·····	(246)
三、学习中文的方法和工具书的编写·····	(250)
四、汉字拉丁化注音与《西儒耳目资》·····	(257)
五、马若瑟的《汉语札记》·····	(260)
第三节 神学与汉字·····	(266)

一、索隐派的理论与渊源	(267)
二、索隐派对汉字的研究	(272)
三、对索隐派诠释方式的分析	(278)
第四节 耶稣会士传入欧洲的中文知识	(281)
一、17 世纪在华耶稣会士关于中文的论述	(281)
二、基尔谢关于中文的论述	(289)
三、补充说明	(296)
第五节 探求一般语言与欧洲的早期中文研究	(298)
一、相关的语言学背景	(298)
二、16、17 世纪语言比较研究中关于中文的论述	(306)
三、中文作为原初语言	(310)
四、汉字作为“真实字符”	(314)
五、莱布尼兹的“一般字符”与汉字	(319)
第六节 探求“中文之钥”	(324)
一、米勒的“中文之钥”	(325)
二、门泽尔的“中文之钥”	(328)
三、巴耶尔的继续探索	(330)
四、傅尔蒙的类似看法	(335)
第七节 19 世纪学术背景下的中文观念	(338)
一、汉学正式形成时期的中文研究	(339)
二、洪堡的中文观	(348)
三、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中文观念	(357)
第八节 逻各斯中心主义与中文	(361)
一、普遍的贬低态度	(361)
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偏见	(368)
第六章 顺应时代需求	
——东正教传教士与俄国汉学	(380)
第一节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由来	(382)
第二节 俄国汉学先行者罗索欣	(387)

一、勤奋的俄罗斯馆学员	(387)
二、俄国科学院汉满语学校	(389)
三、丰硕的翻译成果	(392)
四、杰出的合作者和后继者	(394)
第三节 俄国汉学奠基人比丘林	(397)
一、生平简介	(398)
二、杰出的科学成就	(404)
三、恰克图汉语学校	(416)
四、俄国汉学界的评价	(420)
第四节 享誉欧洲汉学界的卡法罗夫	(422)
一、中国宗教研究	(423)
二、编辑出版《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成员著作集》	(425)
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428)
四、编写辞典	(430)
五、其他研究活动	(431)
第五节 一代汉学宗师瓦西里耶夫	(433)
一、卓越的科学成就	(437)
二、瓦西里耶夫汉学学派	(450)
第六节 俄国最早的汉满语教学基地	(454)
一、百年争论	(454)
二、来自传教士团的汉满语教授	(457)
参考书目	(465)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西方汉学”：跨文化的对话

对于国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在最近一二十年来，显得十分热闹和时髦。但是什么是汉学，学术界仍然有不同看法。主要的分歧是，第一，汉学研究是否包括中国本土对自己的研究？是否只是外国对中国的研究？第二，汉学研究（Sinology）与中国学研究（Chinese Studies）有没有区别，是否前者就是专指对传统中国的研究，后者专指对现实中国的研究？关于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对词语的定义和研究领域的划分问题，此处不论。下面我们只谈第一点。

从目前发表的许多论文、出版的一系列译著和论著看，逐渐占上风的是这样一种声音，即认为汉学是国外或者西方对于中国的研究，是与“国学”相对的一个学科概念。在种种关于“汉学”与“国学”的讨论中，尽管还有分歧，但分歧主要表现在如何平衡“汉学”与“国学”的关系，而其前提则是一致的，就是“汉学”与“国学”是相互对立的两个学科。但事实上，这种对立似乎缺乏必要的依据。西方汉学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学问，这当然没有问题。或者干脆说“汉学”就只是特指西方（或外国）研究中国的学问。问题是，把“汉学”独立出来，究竟有什么意义？是否要有国别的区分？如果有所区分，其根据是什么？

应当明确，“汉学”与“国学”是两种语境下的产物，分别有各自的学术史背景，这就决定了不能贸然将二者对立，就像进行文化比较时首先要遵循必要的规则。如不少专家所言，“汉学”是舶来品，其思想和理论体系仍属“西学”范畴，是西方学术界根据他们的研究对象而界定的一个概念，对西方人而言确实是一个学科。“国学”的概念则显然是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西学大潮滚滚东来时诞生的，是中国人感受到一种异质文化的压力时作出的回应，矛头所指是“西学”无疑。就此而言，在“国学”与“汉学”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可对立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当中国学人努力引进西方学术的研究体系来改造传统学术研究时，“国学”这个概念非但没有被消解，反而更加彰明，与“西学”的对峙也更加强硬。这正说明了“国学”与“西学”的对立是基于二者研究对象的迥异。反观“国学”与“汉学”，二者的对立之所以不成立，根本点在于它们的研究对象同一，都研究中国的文字、语言、历史、文化等等。在解析这些概念时，其实也就涉及到学科的界定问题。

“国学”与“汉学”的研究主体固然不同，但在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以研究主体的区别作为概念对立的依据，岂非在学术研究中自设壁垒，颇有自蔽于同行之嫌。20 世纪 50 年代，德国著名汉学家福赫伯（一名傅海波，Herbert Frank）写过一本书，题目就叫《汉学》（Sinologie），^①这是学术指南丛书“东方学”系列中的一本，其中介绍世界各国的汉学研究情况，就包括中国本土学者的研究成果。其实，我们只要接触过、阅读过外国学者的中国研究成果，就会知道，他们从来不自外于中国同行。恰恰相反，他们热衷于与中国同行的学术对话。原因很简单，人类对于自然和社会的研究本质上是一种认识活动，认识的主体是人，研究对象（比如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是客体。正如数学是全

^① Herbert Franke, *Orientalistik, 1. Teil, Sinologie*, Bern, 1953.

世界的人都研究的科学，欧洲学也是包括欧洲人在内的全世界的人都研究的学问，中国学当然也是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全世界的人都研究的学问。瑞典汉学家罗多弼提出取消“汉学系”而代之以“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语言”等名目，不管是不是有批评者所说的“急躁”之病，至少他正确地理解到中国文化的各项内容可以作为全世界人研究的对象。

研究主体不同必然带来研究方法的区别，我们不能按照主体的不同来划分学科，同样无法以研究方法构筑学科的分野。方法的流动性很强，一类方法可以运用于许多学科的研究，采取不同方法的不同学者之间还可以兼容互补，这种通用性与流动性导致由方法所界定的往往是学派而非学科。几年前（1997），在一次关于德国汉学的回顾与展望的学术讨论会上，法国学者祖费雷发表了《从法国人的角度看德国汉学的发展》的文章，其中提出了“民族汉学”（national sinologies）和“国际汉学”（international sinology）的概念，认为民族汉学就像民族传统一样应该加以保护，因为它是抵抗千篇一律的僵化面孔的积极因素。但是民族汉学应该更多地被介绍、被评论和被摘要到国际性的刊物（英文学术杂志）中，才能被国际学术界所了解和认识。^①这里所谓“民族汉学”主要是指学术研究的特色，事实上就是因浸润研究者的文化背景不同而带来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取向上的特色，其根本立足点仍然是汉学研究的世界普遍性特征。但是为什么有“民族汉学”，这里已经涉及到了汉学家的主体差异性特征。

毕竟，西方汉学确实有不同于中国人本土研究的地方。后者是自我认识、自我反思，前者是与他者的对话，是对“非我族类”的审视。研究对象虽然相同，但是主体条件、主体与对象之

^① Helmut Martin und Christiane Hammer (Hrsg.), *Chinawissenschaften. Deutschsprachige Entwicklungen. Geschichte, Personen, Perspektiven*. Hamburg, 1999. (《中国学在德国的发展：历史、人物、展望》，汉堡，1999年。)

间的关系确实迥然有别。因此，研究什么，不研究什么，如何研究，虽然也有个体的差异，但是更重要的则是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的不同。这就说明身为中国人来考虑西方汉学的独特性时，不能拘泥于学科的概念畛域，而只能从跨文化的对话、从比较文化和文化交流的意义上认识，它才能构成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

总之，西方汉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属于社会科学研究范畴，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跨文化之间的对话。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西方汉学也是人类认识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学术层面意义上说，西方人研究中国与中国人研究中国没有什么两样。高本汉的中国语言研究、伯希和的西域史地考证、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即使对于中国同行来说，也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王国维以来的许多中国学者在自己的学术著作中引用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或者与之商榷，就是本着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精神。西方汉学的学术成果为各个具体问题的研究者所关心。例如，费正清的中国历史研究、谢和耐的中国佛教寺院经济的研究、薛爱华的唐代外来文明的研究等等，所有研究相关领域的学者都应该重视，都应该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参与西方汉学所涉及的各个具体学术问题的讨论，是相关领域的专家的任务。

西方汉学本质上又是一种跨文化之间的对话。由于研究者主体条件的特殊性，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被一些有着异样经验和文化历史背景的西方学者所理解和消化，从而产生了“西方汉学”。如果不从文化关系上来讨论西方汉学，那么单纯的汉学研究就只具有学术情报的性质。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看，西方汉学的发展和繁荣，是中国文化对于西方文化影响的一种表现形式。从历史上看，汉学的发生和发展有个过程，是与“东学西传”和“西学东渐”同时发生同时进行的一个文化交流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于是汉学研究就成为一种文化关系史的研究。由于西方学者所处的文化语境不同，价值观念、学术背景和意识形态也不同，当他们

以自己的母体文化为背景研究中国文化时，其中必然会折射他们的“母体文化”观念。于是西方的中国研究从跨文化的角度看，就成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对话。正如福赫伯在总结 19 世纪欧洲汉学的历史时所说，虽然这些汉学遗产在具体研究结论上已经落伍，但是“十九世纪的汉学史，应该成为欧洲思想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①。

汉学也是西方人认识中国的一种手段，19 世纪汉学在欧洲形成一个学科，表明西方对中国的认识进入到一个有系统方法、明确意图以及理论背景支持的阶段。而汉学学科的萌芽阶段，即传教士时代，显然是一种不同于学术研究的认识阶段，但也有其比较明显的方法体系。在中西交往的早期，传教士时代之前，认识则是随机的、笼统的。到 19 世纪之后，经过学术规范包装的这一认识体系，在传递西方的文化、历史、价值观念方面自然更加便利和有效，但同时它也体现出一种文化理解另一种文化的努力。这种努力不同于传教士们以认同中国文化为前提，是明确以他者的身份进行解读。这是 19 世纪前后两个阶段的一个重要差别。不过传教士们虽然努力使自己融入中国文化，同时代在本土的欧洲人则不然，他们是使中国文化融入本土经验。因此，本土欧洲人与在华传教士打造出的汉学模型是不完全一样的。这也是在华传教士与在本土欧洲人之间的差别。这两种差别的存在，使得传教士时代成为一个特征明显并且孕育学术性汉学的时代，或者说分水岭时代，这也与欧洲综合实力的转折期相吻合。

正是出于对汉学文化本质的如上认识，本书才将注意力投向汉学能够作为一门学科在欧洲登堂入室之前的漫长时光。也正因为这样，在下面谈到“西方汉学”或“汉学”时，所指的更多是其文化意义而较少学科内涵。

① 转引自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中华书局 1994 年版，第 28 页。